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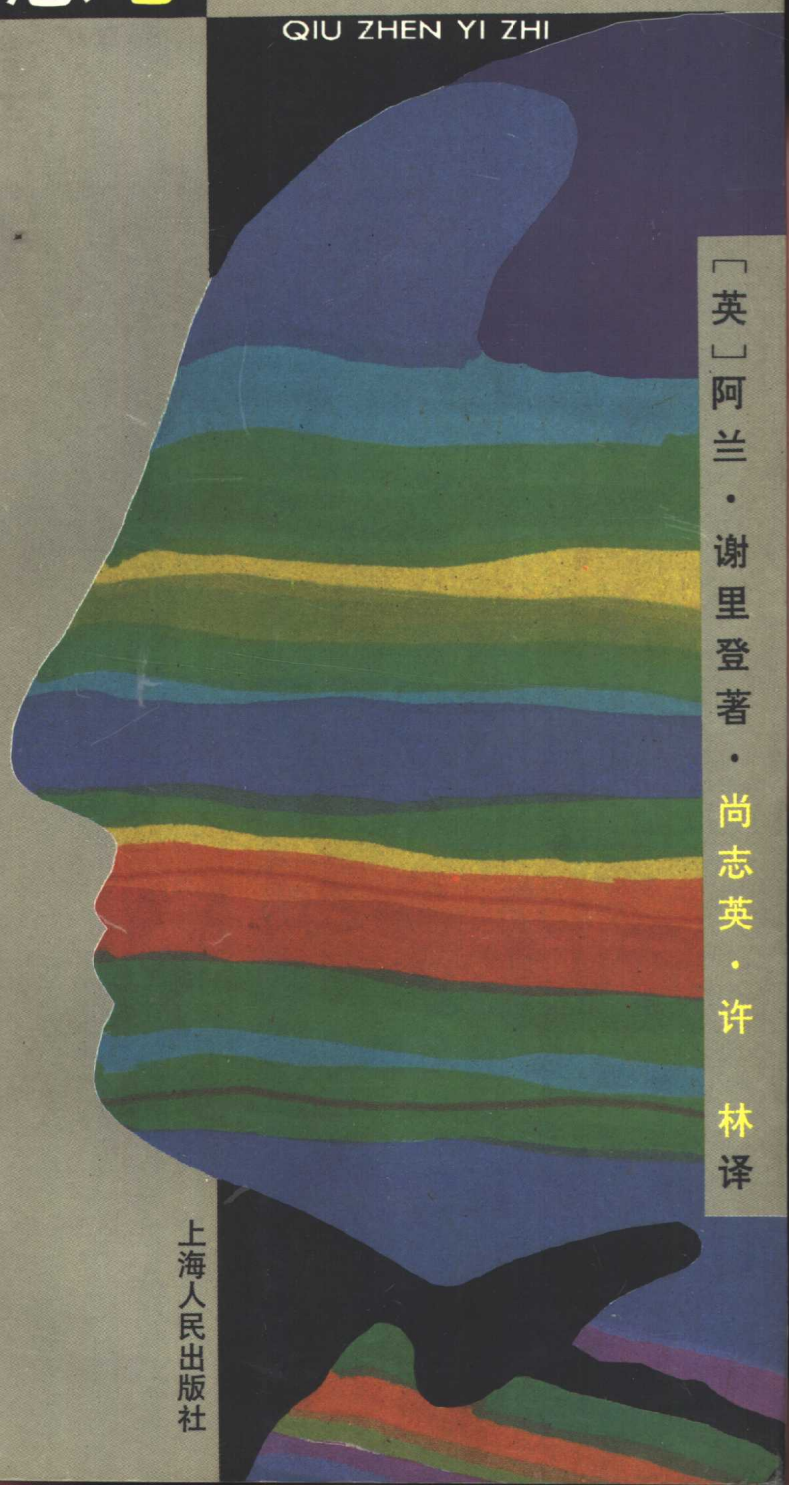
# 求真意志

# Q Z Y Z

QIU ZHEN YI ZHI

——密歇尔·福柯的心路

「英」阿兰·谢里登著·尚志英·许林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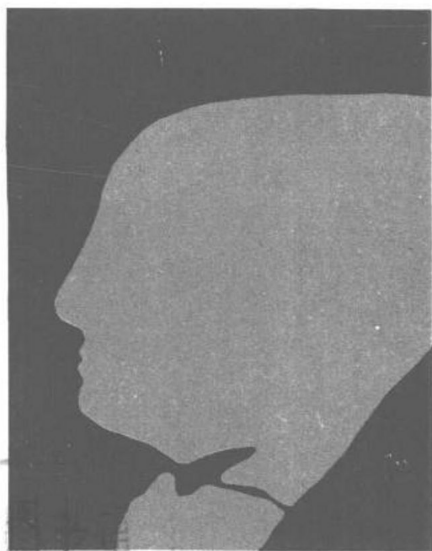
# 求真意志

QIU ZHEN YI ZHI

——密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

[英]阿兰·谢里登著

尚志英 许 林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Alan Sheridan**  
**MICHEI FOUCAULT**  
**The Will to Truth**

本书由英国 Routledge 出版公司授权翻译出版

|      |     |
|------|-----|
| 责任编辑 | 屠玮涓 |
| 美术编辑 | 王晓阳 |
| 封面装帧 | 诸焕庆 |

**·求真意志·**

——密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

[英]阿兰·谢里登著

尚志英 许 林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04,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0565-6/C·25

定价 15.80 元

对于解释的解释比对于事物的解释更难，  
关于书的书比关于任何其它题材的书更多。我  
们只是互相撰写评注罢了。

——密歇尔·德·蒙田

我们很可能属于批评的时代。这个时代缺少原始的哲学家。这在任何时候都使我们想起它的统治和命运：一个使我们无法挽回地远离原始语言的理智时代……历史注定我们要面对历史，要耐心构造话语的话语，要担负倾听已被说出的东西的任务。

——密歇尔·福柯

# 密歇尔·福柯：一幅反叛者的肖像

## (译者前言)

### —

1984年6月25日，当代法国思想大师密歇尔·福柯突然与世长辞。这是继萨特逝世后法国思想界的最重大损失。而对这盏智慧明灯的过早熄灭，法国乃至世界思想界都为之惋惜、为之震动，许多人带着一种惆怅的失落感茫然不知所措。西方学者纷纷认为：“萨特和福柯的相继逝世是两个时代的死亡”，“福柯之死使对于这个时代影响最深远的著述活动中断了”，而“面对福柯的逝世，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的思想所以能进入现代状态，那应归功于他。我们还应该承认，我们所以能走向成熟，也完全在于他的恩泽。”

福柯1926年出生于法国的普瓦捷，其父是一位外科医生。少年时代的福柯在当地一所公立学校就读，后来又

## 2 密歇尔·福柯：一幅反叛者的肖像(译者前言)

转入一所天主教会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抱着探寻“秘密知识”的渴望来到巴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被称作“圣地的圣地”的巴黎高师。当代法国思想史的发展轨迹与巴黎高师休戚相关。正是由于巴黎高师培养出了象萨特这样一大批思想精英，当代法国思想才会如此波澜壮阔，如此色彩绚丽，如此名扬寰宇。福柯在这里如鱼得水，于1948年获哲学学位，于1950年获心理学学位，于1952年获精神病理学文凭。1954年他离开巴黎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法语系任教，此间他开始写作《癫狂史》。1959年他把书稿交给了他从前的老师让·希波利特。在让·希波利特的建议下，福柯将书稿当作博士论文提交，在法国著名学者乔治·康古黑姆的帮助下，它作为“科学史”论文而通过，于是，福柯荣膺了法国国家博士。1960年他重返法国，在克莱蒙——菲兰特大学任教。6年后他去突尼斯大学任教。1968年五月风暴后他去巴黎大学文森学院任教。1970年他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担任“思想系统史教授”直到谢世。

尽管福柯是否是位结构主义者还成为福柯研究中的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福柯本人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本书的作者阿兰·谢里登也不认为福柯是结构主义者)，但西方评论界交口称誉福柯是一位表达社会良心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是用自己的行动和著作说话的思想家。他具有创造思想和介入现实的双重使命感，这充分体现于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著作是思想者心灵独白的外化，是他心路历程的镜子。福柯于50年代中期开始其

笔耕生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的主要著作有：《癫狂史》（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话语的秩序》（1971）、《监督与惩罚》（1975）、《知识的意志》（《性欲史》第1卷，1976）。福柯的这些著作虽文体晦涩，思想深奥，但完全改变了当代法国思想史的走向。福柯的著作之所以具有魅力，不仅因为它们涉猎了诸如癫狂、权力、监狱、性欲之类令人着迷的题材，而且还因为它们的正义感和现实感，即从崭新的视角、全新的方法，提出了与当代社会问题息息相关的真知灼见。诚如福柯认为的那样，根本就没有彻头彻尾的古玩鉴赏家，他是在撰写现在的历史。福柯的每部著作都别出心裁，惊世骇俗。每当一部新著问世时，就有一位新福柯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与尼采彻底否定基督教文化传统相仿，福柯是西方史学传统的破坏者和新史学方法的创立者，同时也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叛者。他曾怀着巨大的忧患预言了“科学时代”的毁灭、“人之时代”（era of man）的终结，他也抱着坚定的信念憧憬着太平盛世的到来。

## 二

福柯早年研究过精神病理学，并在精神病医院实习过。他有机会在那里既不作为病人，也不作为医生，而是以一种没有成见、比较中立、不受传统约束的眼光审视周

围发生的一切。这为日后创作《癫狂史》打下了基础。《癫狂史》是福柯在“尼采伟大探讨的阳光下”迈出的对西方文化考古学探索的第一步，是福柯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此书问世之际，并未引起法国思想界的重视。《现代》杂志只化了五行文字加以评论，并将该书贬得一文不值。只有文学家和艺术家对此书发生兴趣，而那些学院派的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则对它保持沉默。相反，在当时的英国，两位名不见经传的精神病学家R·D·莱恩和D·库珀意识到此书的真正价值，而且莱恩还在“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研究”丛书里出版了它的英译本《癫狂与文明》，库珀为英译本写了导言。到了60年代后期，当莱恩和库珀声誉鹊起的时候，他们的著作开始影响法国思想界。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爆发了“反精神病学”的思想。这时候，《癫狂史》才受到法国人的青睐。在青年精神病学家和大学生对传统精神病学的谴责声中，《癫狂史》成了他们的福音。

《癫狂史》就是对伴随理性时代而产生的传统实证精神病学的抨击。这种抨击早在他的第1部著作《精神病与心理学》中初见端倪。他在这部著作里大声疾呼：“心理学从来不可能说出癫狂的真理！”而在《癫狂史》里他将这个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认为：精神病学表达的是“理性”对“癫狂”的暴虐，它是理性关于精神病的独白。过去300年里处置“精神病”的意义既不是科学性的增加，也不是更有人性的观念和方法的扩展，而是对“理性”的不断效忠，对或是人类自身“必然”的癫狂或是被贴上“癫狂”标签者的不屑一顾。（参见本书第一部第一章）因此，我们

必须抛弃精神病学留给我们的一切关于“癫狂”的观念、看法、技巧和词汇，必须超越理性主义的传统和实证科学的眼界，返至未受理性和科学污染的癫狂自身，去倾听癫狂者的心声，去发现癫狂的秘密。

福柯以上述论点为基础，以详尽的历史材料为佐证，描述了从中世纪末叶经文艺复兴时代和古典时代到19世纪早期这漫长岁月里，西方人对待癫狂和癫狂者态度的变迁。这里可分三个时代：

(1) 中世纪末叶到文艺复兴时代。此时，癫狂与愚蠢、癫狂者与愚人有着不解之缘。癫狂者取代了麻风病人的位置，成了西方人排斥的主要对象。他们被驱逐出城，流落乡间。为了不让他们重返故里，他们被安置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德国著名讽刺诗人布兰特于1494年创作的寓言《愚人船》以艺术的典型，反映了当时通过水道遣送癫狂者和愚人的情形，并导致了“愚人文学”派的产生。我们在伊拉斯谟、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里可以看到癫狂者和愚人那活生生的形象。他们借癫狂者和愚人之口道出了对世界的恐怖，对人生的体悟和对人性的洞识。

(2) 古典时代(17—18世纪)。在这个理性时代，等待癫狂者的不再是航船，而是医院；不再是乘船，而是监禁。伴随着大监禁时代的降临，癫狂者的富有悲剧感的、浩瀚无际的体验销声匿迹了(福柯认为：在戈雅和萨德的作品里还保留着它的遗风)。每个人都得高唱“理性颂”。1656年巴黎普通医院(Hôpital général)的建立标志着这个时代的肇始。数月之后，巴黎人口的1%都被拘留。

普通医院不是什么医疗机构，而是一个具有审判、惩戒、刑罚大权的准司法机关。此间的医生具有法官的权力，他有权决定是否监禁某个人。这一模式旋即在全法国得到效法，并传播到欧洲的其它国家。

（3）现代精神病学和精神病医院时代（18世纪末到现在）。这个时代由法国人皮纳尔开创。他在法国大革命后的5年，推翻了过去监禁机构，创立了实证主义时代的疯人院。他是现代的、人道的态度对待癫狂者的先驱。他的创举实质上是现代实证精神病学的滥觞，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则构成了现代实证精神病学的一支主脉。福柯指出：“精神分析学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无法听到无理性的声音，也无法根据自己的术语解释癫狂者的症状。”（福柯：《癫狂史》法文版，第529页）在按照现代精神病学原则建立的精神病院中，癫狂者虽然在肉体上得到较人道的处置，但在精神上却受到更残酷的监禁，他们或是遭到道德责任感的压抑，或是受到医学技术的摧残，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无法走出理性笼罩的“阴影”。

《癫狂史》的真谛不是对精神病史的详尽周密的回溯，而是通过历史的透视，对西方社会数百年间压制癫狂者的控诉，是对笛卡尔以来西方盛行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反拨。因此，《癫狂史》在精神气质上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一脉相承。在当代法国思想史上，它被称作是对萨特理性力量的总清算，它使我们过去绝对信奉的一切理性似农夫耕地那样完全翻了个儿。

继《癫狂史》之后，福柯出版了专门讨论西方医学史

的著作《临床医学的诞生》。这本书无论在篇幅规模上还是在时间跨度上都小于《癫狂史》。福柯在此书中将视线集聚在诞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临床医学上。他试图通过对分类医学向解剖—临床方法和科学医学转变的描述，揭示医学和疾病、临床讨论和医学报告、历史记录和科学文献的深层结构。福柯对这本专业性颇强的书作了如是界定：“这本书是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它是关于看的行为（the act of seeing）即注视的。”（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英文版ix）福柯自称这本书是他最有魅力的早期著作之一。我觉得，这种魅力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福柯把医学当作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的基础学科；其次是福柯揭示了医学与浪漫主义思想、与命定的孤独的个人感觉、与个人的晦暗的秘密本质的联系；再次是福柯在临床医学里重新揭开了蛰伏于整个古典时代的死亡主题。死亡“开辟了在上帝之死遗留下的虚空中永远敞开的语言之源”。这使我们隐约听到了《词与物》中“人之死”的呐喊。

### 三

1966年，法国各文艺刊物纷纷以“人之死”这一醒目的标题，大书特书地介绍了福柯的《词与物》。《词与物》的出版命运与《癫狂史》迥然有别，它一上架即刻成了法国最畅销的学术书。该书的英译本《事物的秩序》于

1970年由塔维斯托克出版社出版。在60年代末期以战后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的论战为主流的法国思想界,《词与物》无疑是一股拂起轩然大波的劲风。

《词与物》标志着福柯的兴趣已转向西方思想史。但它的宗旨绝不是记录从文艺复兴时代到19世纪末叶西方思想史的形形色色的表层变化,堆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万花筒似的各种事件,而是力图揭示支配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知识密码以及这些密码的配置。福柯认为,知识的密码是词与物的关系,西方思想史的变迁实质上就是词与物关系的重新配置。词与物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配置是思想史的深层结构。为了发现这些结构,就必须抛弃传统的以连续性为原则的历史方法,象考古学家发掘埋藏在地下的人类遗存物一样,去揭示思想史上堆积起来的一层层隐蔽的结构。这便是福柯称之为知识考古学的事业(《词与物》的副标题就叫“人的科学的考古学”)。知识考古学的核心概念是“知识型”(episteme)它在凝聚功能、定向功能和斥异功能上同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范型”有着异曲同工之趣)。它大致可释义为:它是决定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所使用的基本范畴的认识论的结构型式,是某一时代配置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根本性的形成规则,是制约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深层隐蔽的知识密码。人类思想史的断裂是知识型发生格式塔转变的结果。

《词与物》就是关于知识型及其转变的探索。它选择了从文艺复兴时代到19世纪末叶这段时间与有关生物

的、语言的和财富的三种话语，揭示了文艺复兴时代以后由知识型的转变所引起的西方思想史的变化。福柯认为：其间经历了三个时代和三种知识型。

（1）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在福柯看来，原始语言是透明的，词与物同时由上帝创造，它们浑然一体，难解难分。但通天塔之后，语言四分五裂，并丧失了与事物的原始相似。在文艺复兴时代，符号被组成了三元系统：符号、符号指称的事物、连结两者的相类(similitudes)。据此，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体现为相似(resemblance)。福柯指出：在文艺复兴时代，“正是相似指导着文本的诠释和解释；也正是相似组织了符号的作用，构成了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知识，并控制了表现这些的艺术。”（福柯：《词与物》法文版，第32页）相似通过近便(convenientia)、模照(a-emulatio)、类比(analogy)和感应(sympathy)这四种相类(similitudes)形式配置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话语秩序。但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末期，这种知识型便奄奄一息，新旧知识型开始发生转变。福柯认为：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珂德就是这种转变的艺术典型。如果说《唐·吉珂德》第一部表达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那么第二部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古典知识型。当唐·吉珂德既是嘲讽又是消极地告别相似时，“相似和符号已解除了先前的联盟；相类(similitudes)已成为欺骗并濒于幻觉甚或癫狂。……词与物彼此不再相似。”（同上，第61—62页）接着，培根在“四假相”的批判中首当其冲地把矛头指向相似，而笛卡尔则对相似进行了体无完肤的驳斥。这一切表明，

西方思想的知识型在其最根本的配置中发生了裂变，一种新的古典知识型诞生在即。

(2) 古典时代的知识型(17—18世纪)。在古典时代，符号的配置变成二元，能指和所指。词与物之间不再是相似，而是表现(representation)。因此，古典知识型体现为表现。表现在把握事物之间关系时主要根据秩序和分类。古典时代的话语和学科都是以秩序和分类为基础的。古典时代的普通语法、博物学和财富分析这三门代表学科是语言、生物和需求领域里的秩序科学。它们分别由1660年左右的朗斯洛、雷伊和配第创立。在分析事物时，它们采取了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原则。当人们排列简单性质时采取可计算科学(mathesis)，而当排列复杂性质时便凭藉符号系统的分类学(taxonomy)。福柯认为，在表层上看，这三门学科代表着三种话语，各有千秋，但在考古学层面上，它们都由表现所维系。因之，表现的衰落之时便也是古典学科的式微之日。这发生于18世纪末叶。是时，语言、生物、经济这三种话语争先恐后地突破表现的限制。福柯写道：“说话人的朦胧但却执著的精神、生命的狂热激情和不懈努力、需求的潜在能量，所有这些都从表现的存在模式中挣脱出来。……表现话语的统治和表现(它说明自身并以其语词的顺序说出沉睡于事物内部的秩序)的王朝也随之崩溃。这一转变于萨德同时。”(福柯：《词与物》法文版，第222页)法国变态心理作家萨德在18世纪末的地位与塞万提斯在16世纪末相仿。萨德笔下的朱斯蒂娜体现了古典知识型，而朱莉埃特则体现了这一

知识型的土崩瓦解。

(3) 现代知识型(始自 19 世纪)。随着表现的崩溃，构成世界的不是由同一性和差异性原则连结的孤立要素，而是有机的结构与总体发挥功能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功能这个概念以时间为中心，历史在现代思想里扮演着与秩序在古典思想里相仿的基本角色。这里所说的历史不是事件的单纯描写，而是经验科学的“基本存在方式”。当功能概念取代分类概念、历史原则取代秩序原则时，现代知识型便产生了。这种知识型以探求根源(origin)的历史性为特征。由于知识型的变化，古典时代以秩序和分类为基础的普通语法、博物学和财富分析便让位给现代以历史和功能为基础的历史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它们分别由 1800—1810 年左右的鲍普、居维叶和李嘉图创立，体现了共同的现代知识型。

以上就是福柯在《词与物》中所描绘的西方知识型转换的大致轮廓。在理论上，福柯的知识考古有两个特征需在此提出：第一，反人文主义。福柯在《词与物》里对近代人文科学中勃兴的人的概念作了批判性的考察。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代和古典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把人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一个伟大的位置。但福柯认为：西方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人文主义在本质上是虚伪的。从《癫狂史》到《词与物》，福柯的一以贯之的主题便是：随着理性和科学昌盛而来的是人类经验的枯竭，排斥无理性以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的理性不断遭到外界的打击，从尼采开始，理性和科学的不可一

世的统治摇摇欲坠，人文主义大厦的裂纹愈益明显（参见本书第一部第二章）。于是，“犹如在18世纪末叶古典思想的根基所发生的那样，……人类的形象必将象画在海边沙滩的图画一样，被完全抹掉。”（福柯：《词与物》法文版，第398页）世纪之交，尼采将上帝置于死地，从而推翻了从苏格拉底到叔本华的欧洲哲学，而福柯站在尼采的肩上将人置于死地（“人之死”旋即成为风靡西方世界的著名口号），从而完全抛弃了赋予一切救世思想和历史以最终目的的伟大假设。第二，反传统历史观。传统历史是以连续性、因果性和目的论为原则的。福柯强烈反对并完全摒弃了传统历史的这些原则。他的考古学是一种反历史的历史，它以强调历史和认识论中的间断性、断裂、限度和转变为特征，知识型的转变就是一种间断性的转变。福柯的考古学标志着笛卡尔式连续的、积累性的历史观的毁灭，标志着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的出现。

《词与物》的出版是法国知识界的重大事件，在法国思想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由于《词与物》的独创性和晦涩性，它引起了诸多误解，留下了不少问题。3年后福柯出版的《知识考古学》旨在澄清评论界对《词与物》的误解，解决《词与物》遗留的理论问题，并借鉴语言学的手法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论原则和范围作出了系统的阐述。由于它是一部从抽象的角度，专门探讨考古学中使用间断性、断裂、限度、界限、系列和转变这类概念而引发的理论问题的书，因此它的文体极晦涩，杜撰的新术语极繁多，阐述的问题极玄奥，为一般读者望而生畏。但尽管如此，